

嘹亮刚健的军旅之音

近年来军旅报告文学一瞥

■ 佟鑫

回首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由现实进入历史，再由历史反观现实，以文学的方式打通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在互鉴和交融中，历史题材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也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李发锁的《围困长春》，是一部大历史观下的纪实文学佳作。作家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和翔实的数据，将一场著名战役钩沉描摹出来，真实还原了历史场景和细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谢友创作的《肝胆两昆仑》，以刘尔崧及其同胞兄长刘琴西为主人公，梳理了兄弟俩“一门双烈”的革命生涯，抒写了共产党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事迹。作家忠于史实和文献，以高度写实的笔法刻录下个体革命者的生命印记，连缀起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具有深刻的革命教育意义。何建明的《革命者》融合了文学的感染力与史料的真实性，在历史的缝隙中穿梭，由点及面，充满感人肺腑的力量。《革命者》中仅有名有姓的英烈人物就有250余名，其中不少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革命者，是一幅形象鲜明的历史浮雕。无论是笑对敌人屠刀、视死如归的王孝和，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蔡博真、伍仲文，还是历尽坎坷、初心不改的何孟雄，无不让读者真切感受到革命者为了信仰毅然牺牲自我的高贵品质。其他如《漫漫大爱》（张桂柏）、《十三年延安：人民共和国成熟的雏形》（顾伯冲）、《与和战》（赵蔚曾）、《消逝的中共秘史电波》（吴光辉）等作品，深入到历史的褶皱和缝隙中去，填补了过往历史讲述的某些空白，也打开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和思考空间。

谱写慷慨之歌，塑造英雄人物

近年来，军旅报告文学创作观点下沉，越来越多的作品聚焦军旅一线岗位上辛勤耕耘的奉献者，以富于美感和人情味的笔触，丰富了典型人物塑造的美学内涵。

长篇报告文学《万里瞻天红旗扬》成功刻画了“时代楷模”王继才的鲜活形象。写作者在近半年的时间里，采访了王继才的家庭成员和朋友，通过大量细致的实地采访、考察，建立起庞大的信息库，进而通过一个交叉有效的多层结构，为所有素材创造了足够的安放空间和合适的位置。王继才为什么守岛、为守岛付出了什么、王继才精神与时代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也逐一得以解答。作家通过由表及里的观察分析，深入到生活场景的背后，关注人物的现实处境和命运遭际，抓住生活本身内蕴的矛盾冲突，将文学触角伸入到王继才及其家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人性层面的剖析与探微，既展现了人性中软弱、挣扎和犹豫的一面，同时也凸显了超越、战胜自我的光辉一面。作品既弘扬了人物的可贵精神，更启示人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面前，要坚守理想信念和职业精神。在《中国老兵安魂曲》中，高艳国、赵方新讲述了三位抗战老兵的亲身经历，书写了一段跨越海峡两岸的家国往事。作品思想独到深刻，饱含个人命运与时代交错的深邃，充满人性的关照和思辨。更为可贵的是作品将根植于我们民族记忆深处和文化血脉中的善良、坚韧和高贵的品质彰显出来。徐剑的《军姿如山》以丰沛的情感、生动的语言，塑造出形象饱满、气韵生动的“时代楷模”张富清的光辉形象。在这些作品中，创作者通过或诗意或灵动的语言，着重阐扬了人性辉光、英雄正气和精神之美。

拓展题材内容，刻录时代精神

近年来，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在题材内容层面有了很大的拓展，创作者紧随时代大潮，穿透事相的表层去探寻更深沉、复杂的文学内蕴，作品的质地和成色也越发坚实厚重。

李鸣生的《德能无量》是一篇教育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书写了广东黄埔卫校以德建校、以德育人的真实故事，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作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深切思辨使得作品具有极强的时代穿透力。许晨的长篇报告文学《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浓墨重彩地展现了“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创新发展的辉煌历程，书写了海洋科技工作者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感人事迹。

进入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进程为军旅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军旅报告文学在挖掘历史、书写现实、关注变革、讴歌英雄等方面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展现出了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新颖的理念和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技巧，彰显了军旅报告文学强大的文体优势和不懈的创作活力。

艺术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谈艺术、说审美，不少读者有过苦不堪言的“遭遇”或感受。有些“作品”根本没有一句“新话”，更无一点“新智”，要么就是家长里短，要么就是世俗常识，这类“作品”完全是“为作而作”。表象看是作品浅薄、世俗，根本是艺术语言问题。

作品与语言具有怎样的关系？谈语言，先看文学、电影、音乐、绘画等几种艺术门类的命名或概念表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电影是视听语言的艺术，音乐是声音语言的艺术，水墨是笔墨语言的艺术，油画是色彩语言的艺术。艺术与语言，语言与艺术，就以如此的方式，或妙然成趣、或天衣无缝地联结在一起。

显然，艺术建构于语言，语言存在于艺术，好的语言可以成就优秀的艺术作品。

就艺术呈现与表达而言，语言是抽象的，但在具体的艺术形式中，又往往是具体的、实在的。譬如，文学中的语言是文学文本语言，包括文字、词汇、语句、篇章；音乐中的语言是声音，包括旋律、节奏、音色、和声；绘画中的语言是笔墨（颜料），包括线条、形状、色彩、色调。

什么是语言，什么又为艺术语言？透过具体艺术形式，问题之解显而易见。语言是构成艺术形式的最小单元，

也是基本要素，或称基本语素、基本语言：艺术语言是在艺术创作语境下，按美学特征与审美需要，将这些语素进行自由而独特的排列、组合，构成艺术作品的特殊表现方式与实现手段。

可见，语言是艺术构成的前提与基础，艺术语言是艺术呈现的生命与灵魂。并且，不能成为艺术语言的语言，无法进入创作语境；而不能进入艺术语境的语言，没有审美意义，因而也就不能建构艺术作品。

当下文艺创作中，确实存在着语言运用方面的病症或问题，比如陈腐、僵化、空洞、苍白、琐碎、庸俗、世故等，归结概括为一点，就是墨守成规，俗不堪耐。这些令受众失望、令审美无奈的“语言现象”，是对语言于艺术语境中的错置，与艺术创作之本质意义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语言美则艺术美，语言死则艺术亡。语言之于艺术何以唯此为重、荣辱相系？现当代哲学之语言学研究成果，不啻是解答此问的一把钥匙。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这位哲学语言学的标志性人物，在其《逻辑哲学论》之序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事实是事态的存在，语言由命题构成，命题是世界的图像，在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逻辑对应关系。这样，语言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与描述。进言之，此语言是经验世界的语言，用来摹写与描述经验世界，表达与呈现经验世界。

经验世界是现实世界，非经验世界是超验世界。经验世界不仅可说，而且可以说清楚；而超验世界不仅不可说，还应保持沉默。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高远与深奥所在。通过对经验世界的“能说”，表明对超验世界“不能说”之尤其重要，通过经验世界“能够说清楚”表明对超验世界“保持沉默”之特别意义。

其实，“不可说”，不是不说；“保持沉默”，也非为沉默而沉默，而是既不能以经验世界的语言“错置”超验世界，也不能以超验世界的语言“沉默”而沉默于经验世界。换言之，要使超验世界可说，不对超验世界沉默，当须开启超验世界的语言，而超验语言是对经验语言的扬弃，是语言创新，也是语言超越。

显而易见，艺术与美学、宗教、生命、气墨、灵象、性灵、伦理、价值、情感、激情、想象、直觉等命题一样，属于超验领域，存在于超验世界，要表达呈现之，不仅经验语言无能为力，传统艺术语言也难履使命。并且，艺术常新，审美愈高，语言创新无止境，语言超越无极限。

回望文明史，文艺的演进发展正是艺术语言的演进发展。以美术领域观，从原始美术到古典美术是这样，从古典美术到现代艺术也是这样，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同样是这样。在文学领域出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艺复兴、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感伤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也正是由于艺术语言的不断创新，

从而实现文学丰碑的不断矗立。并且，不管哪种艺术门类，凡能开启新的艺术语言形式者，往往能开拓艺术新径、走向艺术高峰。比如忠实于现实主义的曹雪芹、探寻魔幻现实主义的马尔克斯，比如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又开拓浪漫主义的贝多芬、走进抒情抽象主义的朱德群，还比如开启实验立体主义的毕加索、开辟光影水墨山水的李可染等，都是艺术语言探索、创新、重构与超越的典范。

同经验语言不能摹写超验世界一样，传统艺术语言也不能生硬或原封不动地置于当下语境的艺术创作，否则，此类所谓创作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迟滞、倒退、抄袭与复制等问题，从而令艺术走向自我异化，也让艺术永远远离艺术，既有悖艺术精神，又窒息受众审美。这样的“艺术”，不仅不该“说”，而且应该也必须保持“沉默”。

无可置疑，文明愈发展，审美愈不待。艺术创作要践行审美使命、承载时代担当，唯有语言创新，并且终究还是要语言创新。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知这个时代，审视这个时代，进而为这个时代塑形立象、矗立审美，作家、艺术家既要有所仰望天地、放歌灵性的纯朴情怀，更须有举目远眺、跨越文化的高远视野，于超越经验世界的审美境界中，探索构建超验语言、表达超验世界的艺术作品。这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艺术家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

书写深沉的爱与牺牲

——读曾剑长篇小说《向阳生长》

■ 郑润良

写作理论。我的所有书写（除了报告文学）都是自发的，是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一个人，引起我的好感或者同情，甚至怜悯。于是，有一天清晨，他就跳跃在我的笔下。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做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向阳生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从故事的层面可以概括为一个乡村少年成长为部队军官的人生历程。可以将《向阳生长》理解为一部“成长小说”，也可以将它看作曾剑个人的自叙传。正是因为融入了作者个体的亲身经历与情感体验，《向阳生长》也让我这样一个同样从乡土走向都市的70后读者感到由衷地认同与感动。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许多70后作家都经历了从乡村到都市的人生位移。他们人生的前十几年都生活在农村，由此导致了一种深厚的“原乡情结”，让他们在写作中无法忘却乡土曾经带给他们的馈赠和烙印。借由一个乡村少年的视角，《向阳生长》也让我们看到了彼时乡土的痼疾与温情、幽暗与光亮。

一部意蕴丰富的长篇小说总是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读和诠释。除了自叙传、乡土小说，《向阳生长》还可以理解为是一部跨时代的农家军歌、一部

发人深思的战争叙事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家族令人回肠荡气的从军故事。湖北红安，大别山南麓这片被革命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杨氏家族四代人从军卫国的故事，时间跨越近百年。大郎从军，婚姻不幸，但作为军官，敢于承担。二郎当兵未果，成为村长。三郎学篾匠手艺。他见证了乡村手艺人的衰亡，一辈子在与三嫂的争吵中痛苦度日。五郎从军，但他很快离开了部队，他迷恋土地。母亲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一旦儿媳对她不好，就上女儿家，但她还是生了儿子六郎。母亲见外乡人“河口王”一表人才，有能力，把六郎送给他当干儿子。六郎离干爷家出走，当兵，车祸中差点送命，一只手无形地推他一把，他的头因此避开石头而得以活命。多年以后，大郎的儿子再赴军营。这个家族之所以如此向往军营，一方面是出于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现实考虑，另一方面与这块土地的红色基因也有内在的关系。

《向阳生长》中塑造最成功、作者着力最深的角色无疑当属“龙二”这个老兵的形象。他年轻时英俊潇洒，与“我”的秀姑成为恋人。他当兵回来后，却变得邋邋遢遢，不理秀姑，秀姑被迫远嫁大山，他终身未娶。因

我家弟兄多，穷，母亲想把“我”（四郎）过继给他当儿子，因为他嫂嫂干涉未果，最后只认他当干爷（爹）。他在窑场做砖瓦，窑场后是一片松林，林子里坟莹遍地，给“我”带来巨大的恐惧，但也有他给我的浓浓父爱。“我”成为一名军官后，回来探亲，无法相信小时候与他同睡一张床。他那么苍老，病态，咳嗽，“我”有些嫌恶他了。直到21世纪的某个春天，他病得快要死了，却迟迟不肯咽气，等“我”。“我”回到窑场，答应他一个人给他净身，才发觉，他的裆部除了疤痕，几乎是一块平地。这是战争给他留下的创伤。“我”以亲生儿子的身份，送他上山，把他埋在春天里，埋在金黄的油菜花丛。为了掩盖自己的创伤和耻辱，他宁愿不去登记伤残军人身份，黯然回到故乡，面对恋人及其家人的不解和辱骂，毫不辩解。但是为了干儿子的前程，他两次在部队领导面前袒露自己的伤口，这是一种何等深沉的爱和牺牲！“龙二”的一生既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亦彰显出执着坚韧的人性光辉。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有力丰富了当代文学对战争老兵的文学书写。或许，曾剑的《向阳生长》可以视为一个契机，引起我们对战争叙事的省察与思辨。



打靶归来（油画）
杨刚作

长征

第4948期

